

# 北京大学“歌谣学运动” 与四川民俗学的兴起\*

李国太\*\* 徐艳君\*\*\*

**摘要：**从区域视角审视北京大学歌谣学运动，将为理解中国现代民俗学自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多地、多元发展提供新的路径。川籍人士积极参与了歌谣学运动，尤其是为歌谣和民俗的搜集，提供了诸多四川的材料。他们多为寓京学生，部分是社会职员，所搜集的主要为耳熟能详、通行于其家乡所在地的歌谣。搜集人虽缺乏自觉学科意识，也并未采用实地采录之方法，但歌谣学运动中川籍人士的活动，为四川现代民俗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其筚路蓝缕之功不容忽视。

**关键词：**歌谣学运动 四川民俗学 歌谣搜集 区域视角

## 引言

1918年2月1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了《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宣布向全国各地征集歌谣，拟定于“十年本校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为‘汇编’、‘选粹’两书出版期”<sup>①</sup>。“简章”一出，各地积极响应。发表3个月以后，“所收校外外来稿已有八十余起，凡歌谣一千一百余章，

---

\* 该文系2022年度四川省社科规划项目“清代民国四川方志中的民俗与演剧活动研究”（SC22C032）成果，四川省社会科学高水平研究团队“四川濒危活态文献保护研究团队”成果。

\*\* 李国太，文学博士，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民俗学与民间文学。

\*\*\* 徐艳君，四川师范大学2021级中国少数民族语言文学硕士研究生。

① 《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2月1日，第1-2版。

由刘复教授选其最佳者,略加论订,名曰‘歌谣选’”<sup>①</sup>。1920年12月19日,由沈兼士、周作人主其事的北大歌谣研究会成立,1921年北大研究所成立国学门,歌谣研究会并入其中。1922年12月17日《歌谣》周刊<sup>②</sup>创办,1925年6月28日出到九十七号停刊。直到1936年4月4日在胡适的主持下复刊,最终于1937年6月休刊,共出150期,虽前后历时15年,但真正刊文时间只有3年多。据统计,“从1922年12月17日《歌谣》创刊,到1925年6月28日第一次停刊,约两年半的时间里,采集的歌谣共计13339首。”“从1936年4月4日《歌谣》周刊复刊,至1937年6月26日再次停刊,其间共计收到歌谣1977首(不计算收到的三本歌谣集与两本民间文学集)。”<sup>③</sup>可见,《歌谣周刊》从创刊到终刊,其先后征集的歌谣至少有15316首,这可能是20世纪80年代开展中国民间文学“三套集成”之前,中国有史以来有组织地收集歌谣数量最多的一场活动。这场后来被称为“歌谣学运动”的活动,对中国现代民俗学具有奠基性意义,同时也对20世纪中国史学的转向产生了深远影响。数十年来学界对歌谣学运动的缘起、经过与影响已有诸多论述,却相对缺乏从区域视角审视除运动策源地——北大之外的“地方”参与该运动的细节,以及这种参与对20世纪20年代末开始的中国民俗学多元发展的影响。本文将梳理“歌谣学运动”时期四川人<sup>④</sup>搜集、研究歌谣与民俗的情况,力图为多维度地理解“歌谣学运动”的意义提供区域视角。

## 一、歌谣征集中的四川“声音”

1923年3月4日《歌谣周刊》第八号的“公布”中刊登了一则消息:

① 《〈歌谣选〉由日刊发表》,《北京大学日刊》1918年5月20日,第1版。

② 该刊物从创刊到第48号名为《歌谣》,从第49号开始更名为《歌谣周刊》。本文在具体言及某一号时,作《歌谣》与《歌谣周刊》的区分,概括言之时则统一用《歌谣周刊》。另外,本文对《歌谣》周刊的征引,均出自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5年11月影印出版的《歌谣》,下文不再作说明。

③ 葛恒刚:《北大歌谣征集运动的回顾与反思》,《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1期。

④ 本文考察的是20世纪20年代四川民俗学发展情况,因此文中的“四川”包含今重庆直辖市管辖范围。

“蒙吴又陵先生指示说，在《成都通览》上载有许多四川的童谣。并允代为搜寻此书。”作为在四川提倡新文化的“先锋”，吴又陵被胡适称为“中国思想界的清道夫”，陈独秀也称他为“蜀中名宿”。1921年夏，吴又陵离开成都执教于北京大学，直到1925年返川。<sup>①</sup>他在北京的四年，与北大新文化学人胡适、陈独秀等应多有交集，又经历了《歌谣周刊》从创刊到停刊的过程，因此说他是歌谣学运动之亲历者并不为过。<sup>②</sup>“公布”中所言《成都通览》乃清末民初成都著名改良者傅崇矩根据亲历亲闻所记录的一部成都社会之“百科全书”，其中以“成都之小儿女歌谣”之名收录了当时成都地区通行之童谣84首，卷首有按语曰：“不知其由来，相传数千百年，家家户儿莫不知道，可补杨升庵《蜀谚》之缺。”在文末，他又摘录了杨升庵《蜀谚》11首。<sup>③</sup>《成都通览》成书于宣统元年（1909年），下距歌谣学运动之发生还有十余年，傅崇矩搜集童谣固然如其所言是为了补《蜀谚》之缺，但正如歌谣学运动时期的学者将意大利驻华公使韦大列所辑之《北京的歌谣》作为中国歌谣学搜集与研究之肇端，我们似乎也可以将傅崇矩之童谣搜集视为近代蜀中民俗学之开端。但这一涓涓细流汇入中国现代民俗学之时代江河中，还要等到川籍人士积极参与歌谣学运动之时。

1918年北大宣布征集歌谣，许多地方都积极响应，“至1919年5月22日，共发表了征集来的流行于四川、江西、黑龙江、安徽、广东、湖北、江苏、直隶、北平、河南、陕西、山东、浙江、云南、辽宁等省市的148首歌谣”<sup>④</sup>。可见，在《北京大学日刊》时期四川便有人参与其中。《歌谣周刊》创办以后，其成绩远大于《北京大学日刊》时期，他们收集的有关歌谣、民俗资料日益增多，发表了多篇谈论、研究、征题、专号理论探讨性的文章。川籍人士对《歌谣周刊》供稿颇丰，主要提供了三种材料：一是歌谣，二是谜语，三是对某一问题或某一征题的研究与讨论。据《歌谣

① 赵清、郑城编：《吴虞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前言第15-17页。

② 1923年5月14日的《吴虞日记》中便有：“参阅读讲义，寄柚子《歌谣周刊》四张”的记载。参见中国革命博物馆整理：《吴虞日记》（下），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第115页。

③ 傅崇矩：《成都通览》，成都：成都时代出版社，2006，第252-257页。

④ 王文宝：《中国民俗学史》，成都：巴蜀书社，1995，第187页。

周刊》编辑的统计：1922年12月至1923年5月末，收到四川歌谣142首；1923年7月至1924年1月，收到四川歌谣129首；1924年7月至1925年6月末，收到四川歌谣59首；两年多的时间，征集的四川歌谣共330首。1936年《歌谣周刊》复刊后，征集的四川歌谣数量已无从考证。另据笔者统计，从《歌谣周刊》创刊至最终休刊，一共刊登了四川歌谣165首，其中1922年12月至1925年6月末共94首，1936年4月4日至1937年6月26日共71首。<sup>①</sup> 笔者对歌谣的收集者、歌谣来源地、收集歌谣的数量、作者籍贯和身份进行了统计（见表1）：

表1 《歌谣周刊》刊登川籍人士征集歌谣情况一览表

序号	姓名	刊登歌谣数量	歌谣通行区域	搜集者籍贯	搜集者身份
1	郑宾于	8	酉阳	重庆酉阳	北大学生
2	蓝梦九	4	川北、蓬安	四川蓬安	北大农科学生
3	史绍芬	5	成都	不详	不详
4	熊天祉	1	川北南充	四川南充西充县	北大预科学生 法国留学
5	康心白	1	成都	不详	不详
6	予止	3	江津	不详	不详
7	宋佛心	4	广安岳池	不详	不详
8	刘朝选	10	合江	不详	不详
9	梁玉清	14	宜宾	不详	不详
10	孙元良	3	成都	四川成都	北京国立法政大学学生
11	刘伊凡	9	重庆、雅安	四川重庆	裕通钱庄重庆分庄店员
12	任旭	7	南充	不详	不详
13	赖伏鸿	9	南充、不详	不详	不详
14	周敏仲	1	绵竹	不详	北大经济系学生

<sup>①</sup> 本文主要考察歌谣学运动期间四川学人的参与情况，因此考察时段限于1922年至1925年，下文有关搜集者的论述，也主要限定在该时期。

续表1

序号	姓名	刊登歌谣数量	歌谣通行区域	搜集者籍贯	搜集者身份
15	李芳灿	9	梁山	四川梁山 (今梁平)	梁平教师
16	陈自能	3	荣威、南充	四川荣县	北京中国大学学生
17	李惟甯	4	成都	四川成都	不详
18	冯富康	3	成都	四川成都	不详
19	不详	2	成都	不详	不详
20	钟凌如 (茹)	4	成都	不详	不详
21	明	4	成都	不详	不详
22	张天授	2	叙、泸、重庆	不详	不详
23	苏子涵	43	雅安、成都	四川成都	不详
24	仲 侯	12	金沙江上游	陕西三原	不详

从表1可知,《歌谣周刊》刊登的四川歌谣,其来源涉及14个地区的22名搜集者<sup>①</sup>。但因年代久远,加之多数搜集者在历史上其名不显,很多人生平已难以考证。从已考证出的搜集者信息看,四川歌谣的收集者除仲侯外,其余均为四川人。他们大多为寓京学生,有少部分社会职员,所搜集者多为耳熟能详、通行于其家乡所在地的歌谣。这也印证了《歌谣周刊》编辑之一魏建功的说法:

我们惟一的来源实在是大学同学的兴趣合作,所以投送(歌谣)最多的河北、山东、江苏,乃是当时大学同学人数较多的几省。<sup>②</sup>

在《歌谣周刊》上最为活跃的川人,应是郑宾于。郑宾于为重庆酉阳人,1923年进入北京大学国文系旁听,1924年考入北京大学研究所国文系,曾任教于成都师大、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北京中俄大学和福建协和

<sup>①</sup> 其中有两首歌谣没有标明作者。

<sup>②</sup> 常惠:《歌谣采集十五年的回顾》,《歌谣周刊》1927年4月,第3卷第1期,第22-23版。

大学,代表作有《长短句》《文艺琐谈》《中国文学流变史》等。<sup>①</sup> 郑宾于与顾颉刚、吴虞等多有交集,在北大学习期间,参加了歌谣研究会,担任风俗调查会事务员,并出席了北大方言研究会成立会。他以郑孝观、宾于等名为《歌谣周刊》供稿颇多。《歌谣周刊》曾刊载他的供稿情况:

第二号“来件”:十二月二十日,收到郑宾于四川歌谣十四则;

第十六号“来件”:四月十七日收到郑宾于四川酉阳歌谣九则;

第八十一号“来件”:十三年十一月十二日,收到郑宾于四川酉阳歌谣二则。

《歌谣周刊》共计收到郑宾于提供的25则歌谣,后刊登了12则。<sup>②</sup> 另外,第九十七号“来件”记载:“十三年五月二十日,收到郑宾于转直隶磁县张文焯歌谣四则,又直隶阜平王嘉斌歌谣五则,又直隶阜平赵云霄歌谣九则。”郑宾于也是最早响应歌谣学运动的四川人之一,《歌谣周刊》第十一号便已刊登了他搜集的酉阳民歌4首,第十四号又刊登了另外4首。这8首酉阳民歌应该就是他12月20日寄给《歌谣周刊》编辑部的14首民歌中的一部分。在第二次刊登的4首歌谣的末尾,郑宾于还对其流行区域进行了更为具体的描述:“上四首民歌,乃酉阳之东南,南,西南通行者;盖地近贵州沿河县,被其浸淫特甚,故非酉阳全境所通行也。”

除郑宾于外,北京农科学生蓝梦九也积极参与了歌谣的搜集。<sup>③</sup> 其搜集的四川歌谣数量颇丰,《歌谣周刊》第四号“来件”载:“六日,收到蓝梦九四川歌谣四十三则”。但不知何故,《歌谣周刊》只刊登了他4首歌谣,即第十号刊登的通行于川北的《一根树》和通行于蓬安的《一张纸》,以及十一号上以《川北一首》和《蓬安一首》之名刊登的2首。但第二十四号《歌谣周刊》发布了《我们将来的希望》,首先表示歌谣搜集是一件

① 郑宾于著,熊宇飞编:《郑宾于文存》,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

② 熊宇飞在《不该被湮没的现代学者:郑宾于生平略考》中认为,郑宾于为《歌谣周刊》提供了酉阳歌谣11首,应是未将《歌谣》第2号上刊登的“收到郑宾于四川歌谣十四则”计算在内。

③ 据《蓬安县志》(四川辞书出版社,1994年11月,第735页)记载的“1926年(民国5年),终于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北京农业大学”可以推断,蓝梦九在1922年至1926年正在北京读书。

很不容易的事情，因此“弄了好几年并没很大的成绩”，接着叙述道“幸而各地热心的同志们很多，他们极力去搜集”，最后表示因有各位热心的同志，所以“将来的希望很大”，并且说：

这并不是妄想，有许多位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热心不特没有减少了一点，并且还继续极力设法去搜集去。现在特意把这些位在后面都报告给大家。……（十四）四川蓝梦九先生允为搜集。<sup>①</sup>

每省列举出了几位热心收集歌谣的人，而四川的代表仅是蓝梦九，并且期望其可以为《歌谣周刊》继续搜集素材。但遗憾的是，《歌谣周刊》此后再也不见蓝梦九身影，具体原因不得而知，可能与其随后专注于农学，无暇他顾有关。

其他川籍寓京学生如四川华阳人孙元良，1923年考入北京国立法政大学政治科，1924年就读于北京大学预科，其投寄歌谣的消息也曾见于《歌谣周刊》第五号。另《歌谣周刊》第三十一号载：“十月二十九日收到陈自能四川荣县歌谣二十则”。陈自能1922年中学毕业后曾在荣县河街民新学校任教一年，1923年考入了中国大学，由于革命思想深入脑际，1924年南下广州考进黄埔军官学校第三期。<sup>②</sup>可见，在投寄荣县歌谣时，陈自能应就读于北京的中国大学。

除在京川籍学生直接投寄外，当时还有部分四川歌谣由北大职员转交给《歌谣周刊》的编辑，如《歌谣周刊》第二十九号载：“十月十九日，以下由谷源瑞转来……收到李惟远四川成都歌谣四则”。谷源瑞与著名社会学家孙本文、哲学家冯友兰同是北京大学哲学门1915级本科生<sup>③</sup>，曾与李大钊有交往。<sup>④</sup>《沈尹默年谱》就此有所记载。

《校长布告》：十三年至十四年度各委员会委员长及委员名单，业

① 《我们将来的希望》，《歌谣周刊》1923年6月24日，第24号，第1-2版。

②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荣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荣县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1983，第65页。

③ 李浴洋：《缺席与在场——“新文化运动”时期冯友兰的教育经历与文化实践》，《文艺理论与批评》2017年第3期。

④ 王洁：《李大钊北京十年·交往篇》，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0，第66页。

经评议会通过。兹特宣布于下：……本年须编订校章，每次开会时请校长室助教章廷谦、教务处秘书谷源瑞、总务长室秘书苏甲荣出席，藉资接洽。<sup>①</sup>

可见，谷源瑞当时已是北大教务处职员。谷源瑞是山东人，何以会代为转寄四川人李惟远搜集的歌谣，原因不得而知。目前所见李惟远的信息也颇少，只知他是成都人<sup>②</sup>，翻译了罗素《婚姻与道德》，1935年曾出任叙属联立旅省初级中学校长。1939年调教育厅担任督学。<sup>③</sup>但据史轩《早期清华的校园文化》：“1928年以后进入振兴期，成立了清华中国文学会，创办《文学月刊》，组建了文学组织‘晨星社’等，其间代表人物有李健吾、李惟远、曹宝华、郝御风、霍士休等。”<sup>④</sup>由此推测，歌谣学运动时期李惟远可能已经是清华大学学生。另《歌谣周刊》第六十一号记载：“收到尚献生转尚光璧四川成都歌谣十六则。”情况与李惟远相似，尚献生当时为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音研究会会员。李惟远和尚光璧收集的歌谣由当时的北大职员转给《歌谣周刊》，也印证了《歌谣简章》中提出的歌谣搜集的方法：一是本校教员学生，各就闻见所及，自行搜集。有私人搜集寄示，不拘多少，均受欢迎。二是嘱托各省官厅、各级学校或教育机构代为搜集。<sup>⑤</sup>

除在京求学的学生，四川也有部分社会职员参与到歌谣搜集活动中。如《歌谣周刊》第十八号“来件”：“五月七日，收到刘伊凡四川重庆歌谣三十一则。”《歌谣周刊》后从刘伊凡收集的31首歌谣中选载了9首。无论是搜集数量还是刊载数量，与同时代其他四川歌谣的搜集者相比，刘伊凡都较为突出。而刘伊凡当时乃裕通钱庄重庆分庄店员，获知北大征集歌谣的消息并参与其中。据《商贸渝中》记载：

① 酆千明编著：《沈尹默年谱》，上海：上海书画出版社，2018，第168页。

② 中共南京市委党史工作办公室，南京市档案馆编：《南京调查资料校注》（上），南京：南京出版社，2019，第295页。

③ 成都市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编：《成都文史资料选编·教科文卫卷》（上），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第136页。

④ 史轩：《早期清华的校园文化》，《科学时报》2009年9月15日，第4版。

⑤ 李国太、詹勇华：《重观起点：〈歌谣〉周刊与中国歌谣研究的元问题》，《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第1辑），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2022，第8页。



1907年，他出生重庆一贫困家庭，两岁丧父，上有祖母，靠母亲在卷烟厂、火柴厂、缫丝厂等做临工维生……1921年，刚满14岁就进入泸县裕通钱庄重庆分庄做学徒……三年期满，出师当先生（店员）。满师后自取号名伊凡。随后渝庄经理病逝，他负责店务。此后他创立代理其他县区同业小商号重庆业务，如货物运转、行情传报、比期收交等，扩大了业务并逐步树立了社会信用。1926年裕通结束，一直到1942年，他担任过泸县多家糖、油、纱商号重庆代办、重庆“德源”代办经理，兼任蜀南轮船公司职员、新云南轮船会计、重庆糖业同业公会会计、常务理事、德新印刷所会计、代经理等职务。<sup>①</sup>

但刘伊凡毕竟是例外，这种似乎与歌谣搜集无关的从业者参与其中，可能是基于个人爱好，或出于偶然。除刘伊凡外，当时还有中学教师参与歌谣搜集。如《歌谣周刊》第三号“十二月二十七日收到李芳灿四川歌谣九则”，第五十四号“四月十五日收到梁心诚四川宜宾歌谣十八则”，其搜集者当时均为中学教师。李芳灿在新中国成立前是梁平一代名师，曾在梁中等校任教多年。<sup>②</sup>抗战时期，他在梁山县主持“抗日读书会”，常和地下党员接触，后创办了“时进小学”。<sup>③</sup>梁心诚曾任教于叙州联合县立高中，革命烈士李硕勋在宜宾就学时，梁心诚正在该校执教。<sup>④</sup>

可见歌谣学运动期间，参与收集歌谣的川籍人士以在京学生为主，也有部分社会人士参与。学生们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思想开化，不再把歌谣视为乡夫游老之辞，同时又身居该运动的中心——北京，所以能积极响应征集歌谣的号召。

## 二、川籍人士与早期民俗学问题的讨论

《歌谣周刊》不仅为从全国各地搜集的歌谣开辟了一个刊载的专门阵

① 《商贸渝中》编辑委员会：《商贸渝中》，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第459页。

② 梁平县政协文史委员会编：《梁平县文史资料》（第7辑），2003，第187页。

③ 冯鸿甲：《从“抗暴”走向社会》，《重庆陶研文史》2010年第3期。

④ 张松林主编：《不朽的丰碑：纪念李硕勋烈士诞辰100周年文集》，海口：南海出版公司，2002，第129页。

地，也为中国歌谣学和民俗学相关问题的讨论提供了平台。《歌谣》的“发刊词”明确提出搜集、研究歌谣有“文艺的”和“学术的”两大目的<sup>①</sup>，后来在其上展开的讨论就体现了这两大目的。川籍人士除在歌谣征集中积极响应，在相关学术问题的讨论中也并未缺席，其中以郑宾于参与有关歌谣和孟姜女故事的讨论，以及毛坤参与方言问题的讨论最具代表性。其他一些学术史上的“无名者”也有参与。

郑宾于给《歌谣周刊》供稿颇丰，除了征集了数十首四川歌谣和《保定刘守真庙会中得的一首唱歌》外，还在《歌谣周刊》的“婚姻专号之二”发表了《歌谣中的婚姻观》一文。不仅如此，其后又于《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月刊》上发表了《一句成语在元曲中之发见并质疑》《江南风俗一零》《刘爷与刘谷庙》等文章。他对孟姜女故事资料的搜集也颇有成就，有《〈畿辅通志〉中的孟姜女》《孟姜女在〈元曲选〉中的传说》《〈广列女传〉中的杞植妻和杞梁妻》《〈哭泉孟姜女祠记〉及其他》。这一系列有关孟姜女的讨论，除《孟姜女在〈元曲选〉中的传说》外，其他三文均以书信的方式刊载，抬头用“颀刚兄”称呼，而四篇文章的后面，也均附有顾颀刚的“按语”，可见这些文章均是对顾颀刚提倡搜集孟姜女故事相关材料的呼应，文章内容主要是披露作者自己所见到的孟姜女故事文献。

其实早在《歌谣周刊》第十五号的“来稿照登”中，便刊载了郑宾于给《歌谣》编辑的一封信，其中通过分析他所熟悉的家乡酉阳的歌谣，提出问答体的歌谣不限于“七言式”的四句一种模式。<sup>②</sup>而《歌谣中的婚姻观》一文则通过对歌谣内容的解读，窥探其中蕴含的婚姻观念。该文在内容上并未突破时代的局限，却是受董作宾之邀专为“婚姻专号”而作，这本身说明郑宾于作为歌谣学运动学人群体之一员是毋庸置疑的。该文的一大贡献——如作者自己所言——则是首先刊载了几首可被归入“猥褻粗鄙”之列的歌谣，这在当时无疑是需要一定勇气的。

除郑宾于积极参与《歌谣周刊》中有关歌谣的讨论外，李璞也无意间

① 《发刊词》，《歌谣》1922年12月17日，第1号，第1版。

② 郑宾于：《来稿照登》，《歌谣周刊》1923年4月22日，第15号，第5版。

参与了有关医事歌谣的讨论。《歌谣周刊》第六十五号刊登了魏建功《医事用的歌谣》一文。魏建功在文中列举了几种他家乡江苏如皋有关医事的歌谣后，提出：

这一类的东西半属于风俗的范畴，又半属于歌谣(?)的范畴，我们把他调查出来，可以比较各处的习惯知民族关于医事的常识和心理……这类东西是属于歌谣范围内的呢？这个问题还请大家赐教。<sup>①</sup>

该文后还附有董作宾记录的几条河南南阳的医事歌谣的例子。董作宾将目的也阐述得十分清楚，那就是希望“引起读者的兴趣，也想出几条这类的歌谣来，大家研究研究”。魏建功、董作宾的文章发表后，直到《歌谣周刊》七十四号上才出现刘策奇的《迷信的术语》和杨德瑞的《读“医事用的歌谣”的杂感》两篇呼应的文章。但刘策奇开章明义地表示：“这种词句，与其叫他作‘医事用的歌谣’，无宁叫作‘迷信的术语?’。”以此回应魏建功提出的此种民俗词句是否可以被称为歌谣的问题。即便如此，他最后还是承认“把他总集起来研究，于民俗心理学也不无小补”<sup>②</sup>。杨德瑞也认为：“这类东西全是近于迷信的，实非智者所为，我以为这是风俗范围以内的，希望大家对于这种东西，广为搜集，俾使调查风俗者，考究方言者，而得些帮助。”<sup>③</sup>李璞发表在《歌谣周刊》七十四号上的《川东通行的医事歌谣》正是在此背景下诞生的。据文中自述可知，李璞为川东人无疑，但除此之外我们并不清楚他一生行迹，更遑论刊载此文时的情况了。但该文开篇说：

我今天见到杨德瑞君的读医事用的歌谣的杂感一文，所引的歌谣，颇与我家乡川东一带通行的相同。但是魏、董二君所述的例子我未见到，所以只将现在尚记得的，照着杨君的例子写出来。<sup>④</sup>

① 魏建功：《医事用的歌谣》，《歌谣周刊》1924年10月26日，第65号，第1-2版。

② 刘策奇：《迷信的术语》，《歌谣周刊》1924年12月28日，第74号，第1-2版。

③ 杨德瑞：《读“医事用的歌谣”的杂感》，《歌谣周刊》1924年12月28日，第74号，第3版。

④ 李璞：《川东通行的医事歌谣》，《歌谣周刊》1925年1月18日，第74号，第1-2版。

由此可知,李璞写作此文具有偶然性。从他未曾见到魏建功、董作宾的文章来看,他并没有机会窥见《歌谣周刊》全貌,对该讨论的缘起可能也并不清楚,仅在偶然阅读了杨德瑞的文章后,才决定将自己亲见亲闻之医事歌谣录寄发表。他虽不曾自觉参与“医事歌谣”的讨论,却客观上为该话题提供了四川案例。

除参与歌谣、民间故事等问题的讨论外,歌谣学运动期间的方言讨论中也不乏川籍人士的身影。方言问题与歌谣征集相伴而生,1918年2月公布的《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中,就提出由钱玄同、沈兼士二人考订方言。随着歌谣收集、整理的开展和研究的深入,方言、方音等开始成为独立于歌谣之外的问题进入《歌谣周刊》的讨论范围。<sup>①</sup>1924年1月26日成立了北大研究所国学门方言方音调查会,5月17日该会第二次常会通过简章,改名为北大方言研究会,但对于该研究会的命名,一直存在争议,四川的毛坤<sup>②</sup>便是争议的发起者之一。

早在方言调查会成立之前,毛坤给沈兼士、钱玄同和林语堂的信中就提出“‘方音’二字比‘方言’二字较好”,并给出三点理由。一是“各地语言之所以不同全在于音”;二是从调查上说,用方言的名义,无法实行玉堂所说就语言所行地域之远近画一图表;三是从改革上说,用方言二字,仍会沿用扬子云、章太炎等人的研究方法,不利于革新。<sup>③</sup>针对毛坤的观点,董作宾迅速作出回应,坚持“方言”的用法,并且认为之所以人们会觉得“方音”比“方言”好,原因在于从扬雄开始,中国古代的方言研究都重词汇,因此把广义的方言变为只重词汇的狭义方言了。经过讨论后,毛坤的观点被扬弃。

<sup>①</sup> 李国太:《北京大学歌谣学运动与歌谣学派的方言研究》,《四川省语言学会成立四十周年庆祝大会暨第二十一届学术年会论文集》(上),2021,第426-440页。

<sup>②</sup> 毛坤字良坤,号体六,又号铁炉,四川宜宾人,1900年出生,1905年在私塾读书,1915年考入成都师范学堂,1920年毕业,留校任教。同年毛坤为了深造,约同窗数人沿江东下,经安徽北上京师,考入北京大学文科预科,1922年毕业后升入北大哲学系。参见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续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251-252页。

<sup>③</sup> 毛坤:《为方言进一解·毛坤给沈兼士、钱玄同和林语堂的信》,《歌谣》1924年4月6日,第49号,第3版。

有意思的是，毛坤在论述中还顺便言及四川方言的分区问题，他说：

我们四川自有其天然的分域，如沱江上游，国音之所谓去声入声多读若阳平，沱江下游，国音之所谓入声（修正过的国音字典）多读为去声，岷江沿岸州县，于国音之所谓入声，全都读的出来，（外乎此者，不能读入声）其他川东川北，皆有自然的分域，釐不乱。<sup>①</sup>

毛坤引此段文字虽然是为了说明方言区划全由方音差异决定，但这可能也是目前所见对四川方言进行的最早的分区。

除此之外，毛坤还在《歌谣周刊》第五十五号上发表了成都方言标音实例。《歌谣周刊》第五十五号乃“方言标音专号”，卷首刊载有林语堂的《方言调查方音字母草案》，紧接其后的是对北京、苏州、绍兴、绩溪、南阳、黄冈、湘潭、昆明、广州、潮州、厦门、成都、福州、焦岭共计14个点的方言标音实例，其中成都音的发音人和标音者均为毛坤。可见，将毛坤视为中国最早一批从事现代方言研究的川籍人士并不为过。《歌谣周刊》第八十九号还发表了毛坤翻译的马伦笃夫之《关于中国之异族语及中国方言之分类》。毛坤在文末按语中说：“按本篇 Mollendorff 所论恐不免全无误处，惟其中足供参考之事实亦不少，故全盘译出，以便有心方言研究者之参照。”<sup>②</sup> 其理性之态度，可见一斑。遗憾的是，作为四川最早致力于现代汉语方言研究的学者之一，毛坤后来并未在此道路上继续前行，而是成为中国图书馆学的开拓者。<sup>③</sup>

有学者研究已指出：“周刊的第49号可以看作办刊方向的一个转折点……转折之后的《歌谣周刊》则不再将眼光局限于歌谣，更多地向民俗倾斜。不仅在文学方面增加了谜语、谚语、歇后语、童话、寓言、地方传说等形式，还有属于俗文学范围的民间小曲、小调和唱本等，更重要的是

① 毛坤：《为方言进一解·毛坤给沈兼士、钱玄同和林语堂的信》，《歌谣》1924年4月6日，第49号，第3-4版。

② 马伦笃夫著，毛坤译：《关于中国之异族语及中国方言之分类》，《歌谣周刊》1925年5月3日，第89号，第6版。

③ 四川省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四川省文史馆编：《四川近现代文化人物·续编》，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9，第251-257页。

增加了民俗方面的研究和讨论。”<sup>①</sup> 川籍人士也参与到各种民俗资料的征集与相关问题讨论中。例如,《歌谣周刊》第七十二号的“征题”中,刊载了“腊八粥”的征题,其说明文字如下:

旧历十二月初八,俗称“小年下”,也叫他“腊八几”<sup>②</sup>,这一天,大家小户,都是要吃一顿“腊八粥”的,读者诸君,您吃过吗?请您材料做法,写出来给我们!您没吃过吗?也请您告诉我们一声,使我们知道贵处的风俗,干脆说吧:我们打算在腊八日,出这么一个专号呢。再关于各处“腊八几”的歌谣谚语传说等等,尤其欢迎。<sup>③</sup>

随后《歌谣周刊》第七十五号便是“腊八粥专号”,刊登了北京、南阳、山西、束鹿、崇明五个地区有关腊八粥的习俗。在5篇文章刊载完后,又附有一段文字:

我们为征求的普遍与便利,曾作四个简单的问题分头向各处直接调查,成绩倒很不坏,只可惜时间太促迫了,终于没有做到完密的境地。<sup>④</sup>

在应征的十余篇文字中,便有成都祝逢春、彭水王季和、峨眉金满成对其所在地腊八粥相关习俗的调查。除此之外,郑宾于也提供了资料,但他的调查结果显示酉阳无“腊八粥”的说法,更无相关民俗。<sup>⑤</sup> 虽然在当时众多民俗问题讨论中,有关腊八粥习俗的讨论并不深入,所拟定的调查提纲也较为简洁,但四川有4人参与其中,也从侧面说明歌谣学运动在四川地区还是产生了一定影响。

总而言之,歌谣学运动时期以郑宾于和毛坤为代表的川籍学人积极参与与歌谣与民俗问题的讨论,且与学界名流顾颉刚、董作宾、林语堂等过从甚密。但整体而言,参与人员的数量和讨论问题的深度十分有限,不过他

① 方曙:《〈歌谣周刊〉与北大歌谣运动》,《大学图书情报学刊》2007年第2期。

② “腊八几”应为“腊八节”之讹误。

③ 《本刊征题八》,《歌谣周刊》1924年12月14日,第72号,第8版。

④ 《歌谣周刊》1925年1月4日,第75号,第6版。

⑤ 《歌谣周刊》1925年1月4日,第75号,第8版。

们有限的参与也恰好证实了歌谣学运动是寓京学者发起的一场“眼光向下的革命”，它虽指向“全国”，实际影响则主要限于华北、中原和江南等区域，西南、西北等地相对沉寂。

## 余 论

1927年蜀中大儒刘咸炘撰著《浅书续录》，其中有“考古民风纲目”和“土风纲目”两门。“考古民风纲目”包括谣谚、格言、故事小说、游戏等内容，“土风纲目”后标注有“北京大学风俗调查会表所列”，所列内容则完全誊抄自风俗调查会制定的调查表格。<sup>①</sup>《浅书续录》是刘咸炘写给弟子的治学门径之书，所开列书目应是他认为必有可观者。作为深谙中国传统学问之道的大儒，他能将风俗调查表格列入其中，固然与他历来重视“民风”有关，但也从侧面说明歌谣学运动之影响已及蜀中儒林。由是观之，四川民俗学发展的标志性事件是20世纪30年代于飞、樊缜在重庆成立民俗学会、出版《民俗周刊》，但其肇始则应前溯至川籍人士积极参与歌谣学运动。当时的参与者虽人数不多，参与深度有限，且多没有学科自觉意识，往往是基于个人的兴趣、爱好偶一为之，后来也未在民俗学研究道路上继续前行，但这些有限的参与毕竟引起了蜀中人士的注意，使中国现代民俗学之风吹进巴蜀大地。从这个意义上说，四川民俗学与中国民俗学的整体发展基本同步。这也启示我们，对20世纪中国民俗学史的研究，如立足于运动“策源地”和“中心”的考察，则需充分肯定北大时期、中大时期、杭州时期的历史贡献；如从“区域”或“边缘”视角出发，考察全国各地民俗学从萌芽到发展的过程，则为理解中国民俗学的多元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的路径。

<sup>①</sup> 黄曙辉编校：《刘咸炘学术论集·文学讲义编》，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第193-196页。